

## 鴉片戰爭前的澳門

梁增劍 \*

**摘要** 澳門位於廣東省珠江口西側，原屬香山縣（今中山市），與香港犄角相對，毗鄰珠海，是廣東珠江口的重要門戶。澳門作為鴉片戰爭前最早開放的港口和重要的貿易中轉港，它是中外關係的紐帶，曾經在中外貿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了解鴉片戰爭前澳門的歷史對我們全面理解中國近代史，以及促進澳門今後的穩定和發展，無疑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擬對鴉片戰爭前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討，以求指教。

**關鍵詞** 鴉片戰爭前；澳門；政治；經濟文化

### 一、鴉片戰爭前澳門的政治

澳門港早期是個人跡罕至的漁村，鴉片戰爭前的澳門主要區域和活動範圍僅在半島範圍之內，其後活動範圍不斷擴大。起初，外國商船泊岸後，只在岸邊搭起臨時帳篷進行貿易，貿易結束後隨即離開，不允許長時間的逗留，更不能在此長期居留。1553年，“舶夷趨壕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狗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壕鏡為舶簞矣。”<sup>1</sup>海道副使汪柏於1553年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門岸邊搭棚暫住。1554年，他又批准葡萄牙人繳納貨稅，在廣東各海港貿易。自此葡萄牙人獲得了在澳門貿易和上岸暫住的權利。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暫住後，便趁機大興土木，建造房屋。

從1557年至1564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建造了一千多座房屋，從葡萄牙本國移民澳門的人數也與日俱增。隨着貿易交往的興盛，澳門逐漸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港口小城。葡萄牙人在澳門建造房屋事先根本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但當地中國官員因收受葡萄牙人的賄賂而未予制止。當澳門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的時候，葡萄



圖1. 澳門南灣景色（英國海事博物館藏）

牙人不僅擴建房宅，而且加強軍事設施，還偷漏船鈔、貨稅，私買中國奸商偷運到澳門的貨物等，更有甚者，未經中國政府的允許，擅自在聖保祿教堂以北地區修築城牆和在青洲興建小教堂。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這些超乎正常貿易的舉動，引起文武官員的注意和憂慮，他們先後向明朝皇帝上疏稟奏，認為葡萄牙人進入和賃居澳門，對國家安全構成危險，將帶來巨大隱患。他們提出三種對付澳門葡人的主張：第一，以龐尚鵬、郭尚賓為代表，提出讓葡萄牙人離開澳門到浪白澳去貿易；第二，以總兵俞大猷和

\*梁增劍：華南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鴉片戰爭博物館館員。

番禺舉人盧廷龍為代表，提出驅逐葡萄牙人出澳門；第三，以廣東巡撫霍與瑕、兩廣總督張鳴岡為代表，提出准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貿易，加強防範和管理。

霍與瑕論述道：“建城縣官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謝絕其來，中策也；若握其喉，絕其食，激起變而剿之，斯下策矣。……尚其哀其存留願為編戶，乃請於朝，建設城池，張官置吏，以漢法約束之，此謂用夏變夷，故曰上策。”<sup>2</sup>

張鳴岡也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傳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剿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即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啟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為愈也。”<sup>3</sup>

1614年，明政府採納了霍與瑕和張鳴岡的奏請，正式決定准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貿易、建城設官、加強管理和防範。這種做法也被後來的清政府所遵循。

由於明政府對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採取了較為寬鬆的政策，使得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了一些權利。第一，明政府允許葡人在澳門建造房屋長期居住，但葡人必須每年繳納地租500兩白銀，由香山縣負責徵收。這表明葡萄牙人正式取得了在澳門長期的居留權。第二，明政府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貿易，每年需向中國政府繳納20,000兩白銀的商稅，此舉表明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澳門的貿易權。第三，1560年澳門建立了以兵頭、大法官和主教為首的葡人自治機構，以維護這個居留地的正常社會秩序。自此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門的自治權。

1583年，澳門成立了市政議會。1623年，葡萄牙任命了首屆澳門總督。葡萄牙人雖然一

直企圖在澳門建立殖民統治，但懾於中國政府的強大壓力，它只能公開表示“恭順守法”，接受管理。

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擁有一定自主權，但澳門始終是個在中國政府管轄之下，由葡萄牙人經營的貿易港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前。

明朝中期以前的澳門，在行政系統上由廣東省香山縣管轄，沒有自己獨立的行政機構。1535年開埠後，明政府在澳門派駐了“守澳官”，負責港口的管理，“守澳官”由下級武官擔任，隸屬廣東海防海道副使管轄，這是最早設立管理澳門的官吏。

1574年，明政府在扼澳門與香山縣咽喉的蓮花莖上設立關閘，“設官守之”<sup>4</sup>，並規定如下：不許外商越關進入內地，也不許內地居民隨便進出澳門；每月開關六次，以後改為每十五天開放一次，以供應外商糧食和日常生活用品；除規定時間外，門上貼有六道封條，上面寫有“畏威懷德”等漢字；澳門居民所需的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只有在開關之日才能出入關閘。這些規定無形中已把澳門視為特殊區域。

1614年，“設參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sup>5</sup>關閘駐軍增至一千人，編為雍陌營，由參將（三品武官）統領。進一步完善了澳門的管理制度。

1621年，明政府繼續在澳門周圍增兵就近防守。設置水兵一千兩百餘名，把總三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分別在澳門的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掛鉞角、橫洲、深井、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星門等處駐防。<sup>6</sup>

清初，清政府厲行海禁，對澳門的防範更加嚴密。1647年，派參將把守前山寨，統領兵員1,000名，分設左右兩營，有兩名千總，四名把總。1662年，兵員增至1,500名。1664年，

## 城市形象



圖 2. 媽閣廊及內港景色（英國海事博物館藏）

又增至 2,000 名，並派一名副將統領。副將以下，增設左右營部都司僉書和守備。<sup>7</sup>

1731 年，兩廣總督郝玉麟奏請朝廷批准，在澳門前山寨設立縣丞衙門，作為縣政府派駐機構“察理民夷，以專責成”。<sup>8</sup> 據清代官制，縣丞是知縣的副職，派出副知縣一級官員專門駐守澳門，說明澳門地位的重要性。駐軍的不斷增加和指揮官級別的不斷提高，反映了清政府對澳門防務的愈加重視。

隨着澳門貿易地位和國際影響的提高，清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對澳門的管理。1743 年，兩廣總督策楞、按察使司潘思渠等向朝廷提出，澳門為“夷人聚居之地，海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現駐縣丞一員，實不足以資彈壓”，要

求在縣丞之上，再增設職權更大的“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宣佈朝廷之德意，申明國家之典章”，“遇有奸匪竄匿唆誘、民夷鬥爭盜竊，及販賣人口、私運禁物等事，悉歸查察辦理”。<sup>9</sup> 並規定縣丞衙門與澳門駐軍均由澳門同知指揮。朝廷同意了他們的建議。1744 年，首任澳門同知到位，並制定了《管理澳夷章程》。按照清朝官職，同知是府的副職，正五品。常駐澳門的官員由副知縣升格為副知府，說明清政府更加重視加強對澳門的管理與控制。

清政府除了從行政上和軍事上加強對澳門的管理外，還通過對澳葡徵收地租來進行管理。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起，香山縣政府對澳葡每年徵收 500 兩銀子。



圖 3. 從遊廊上遠眺南灣（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其中，從 1651 年起，清廷曾一度允許澳葡免租三年。至 1653 年恢復收租時，葡萄牙人企圖不交，清官員扣押了葡萄牙人的翻譯作為人質，澳葡最後屈服表示願意繼續交租，但請求降至每年 300 兩。三年後，清廷又將租金恢復為每年 500 兩。在葡萄牙里斯本東坡塔國家檔案館中，至今保存着大量有關香山縣與澳門關係的文獻史料，其中包括徵收澳門地租的文件。<sup>10</sup>

葡人居澳以後，從 1573 年至 1849 年的近三百年間，中國政府一直對澳葡徵收地租。除了每年徵收澳門地租之外，中國政府還向澳葡徵收商稅，由此也說明了自古以來中國對澳門的管理和主權歸屬是毋庸置疑的。

## 二、鴉片戰爭前澳門的經濟

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澳門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進入了繁榮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澳門成了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國際商埠。

澳門是葡萄牙—印度—中國—日本貿易航線的重要樞紐。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後，先將貿易航線從歐洲開闢到印度，接着他們以印度的果阿為起點，開闢了聯結澳門和日本的貿易航線。<sup>11</sup> 通過澳門這個窗口，他們可以直接從中國內地大批採購生絲、絲綢等中國特產在日本高價銷售，而又用日本廉價的白銀到中國來購買貨物，從中轉手獲得巨大利潤。與此同時，從澳門經印度運回葡萄牙的絲綢、瓷器

## 城市形象



圖 4. 媽閣廟外的廣場（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和日本特產等因深受歐洲人的歡迎而獲得豐厚的利潤，這條直接起點在果阿、樞紐在澳門的對華對日貿易航線，是葡萄牙人經營的所有貿易航線中利潤最大的一條。<sup>12</sup>

澳門又是中國—菲律賓—墨西哥—秘魯貿易航線的起點之一。明代的中國商船從漳州出發，駛往菲律賓的馬尼拉港。同時，每年都有多艘葡萄牙商船自澳門駛往馬尼拉。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商品主要來自中國、日本、印度等國，品種達數十種，主要有中國的生絲、絲織品、瓷器、傢俱、棉花、鐵鍋等。馬尼拉居民消費了部分商品，剩餘部分轉運到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墨西哥的居民消費了大批棉布、瓷器等，大部分生絲在當地的絲織廠織成絲織品，然後再運往西班牙在拉丁美洲

的另一個殖民地秘魯。與對日貿易一樣，對菲貿易也給澳門葡萄牙人帶來了巨大利益。尤其是葡萄牙人壟斷中、菲之間的私貨貿易後，他們從澳門將生絲、絲織品運往馬尼拉，來回一次能賺百分百的利潤。這條聯結南亞和拉丁美洲的貿易航線使澳門更加繁榮。<sup>13</sup>

此外，澳門與大、小巽他群島之間也存在着貿易航線。在澳葡萄牙人很早就與屬於大巽他群島的蘇拉威西島的土著居民進行貿易，貨物的集散地是位於該島西南的望加錫。他們通常於每年的11月或12月抵達望加錫，於第二年5月返回澳門。他們帶去的商品主要有帝汶島的檀香、馬魯古群島的丁香、鉛石等。這條航線成為促進澳門經濟繁榮的又一因素。



圖 5. 南灣景色（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澳門經濟快速發展和繁榮，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澳門是天然的優良港口，水陸交通方便，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二、明政府給予澳門的葡萄牙人許多商稅優待，客觀促進了貿易繁榮。三、葡萄牙處在海外擴張的黃金時代，它建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壟斷了海上貿易，能為澳門對外貿易護航。四、明朝厲行海禁，1522年起只有廣州市舶司一處開放，而廣州的貿易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

澳門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社會具有影響。首先，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葡萄牙人在經由澳門輸入世界各地商品的同時也向中國輸送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同時，古老的中國文化也對西方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次，促進了世界市場的形成。澳

門捲入世界貿易市場運轉之中，它通過澳門—麻六甲—果阿—好望角—里斯本航線，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三大洲，又通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而通連亞洲和南北美洲。於是，中國在當時世界貿易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

澳葡的經濟繁榮持續半個多世紀之後，逐漸走向衰落。

首先，澳葡與廣東的貿易受到沉重打擊。一方面，葡人自從獲准進入廣州貿易以後，進行了在廣州海關瞞稅逃稅、沿海走私活動、島上修築城牆和修建炮台等一系列違法活動，使澳門成為中國領土內的“國中之國”，構成了對省城廣州嚴重的潛在威脅。明政府根據廣東總督的奏章，於1640年6月11日頒發諭旨，

## 城市形象



圖 6. 從西望洋山俯瞰澳門中部（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正式宣佈不許葡人到廣州貿易。澳葡失去了廣州這一巨大的供貨市場，嚴重影響了亞、非的轉運貿易。另一方面，為了對付南明反清勢力和據守台灣的鄭氏集團，清政府實行比明朝更嚴厲的海禁政策。清政府在 1655 至 1675 年間，五次頒佈“禁海令”，並於 1661、1662、1678 年多次頒佈了遷海令，規定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至四十里，築邊牆為界，不許逾越一步，於是，海外貿易一概停止。按照遷海令的規定，澳門亦在遷移之列。遷海令頒佈後，清政府立即封鎖了海上交通。澳葡通過公開賄賂廣東政府官員，最終獲得了繼續在澳門居留與貿易的權利。儘管如此，澳葡與沿海各省的貿易往來仍然受到牽制。

其次，澳葡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被排斥。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雙方貿易處於下降趨勢。1636 年，貿易額下降至最低點。這一年日本出口額為白銀二百三十五萬日本兩，只相當於鼎盛時期的一半左右。主要由兩個因素造成：一是日本幕府看到葡萄牙天主教勢力在日本的影響不斷擴大，並且參與國內的政治鬥爭，因而對葡人產生猜忌。二是十七世紀以後，西方國家，尤其是荷蘭，也先後到日本進行貿易活動，削弱了葡人在日本的貿易地位。

再次，澳葡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也受到了打擊。1640 年 12 月，葡萄牙爆發起義，擺脫西班牙長達 60 年的統治，恢復獨立，組成了新政府。但這個革命性的歷史事件卻對澳葡與馬尼拉的貿易帶來了不利影響。馬尼拉是西班牙



圖 7. 澳門的南灣與內港（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的殖民地，西班牙政府原把澳葡作為它的海外臣民，從而允許它在馬尼拉進行貿易。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兩個國家，馬尼拉總督便企圖以保持貿易為誘餌，迫使澳葡歸順西班牙，但遭到澳門全體葡商的抵制和發生暴動，西班牙為此進行報復，宣佈斷絕馬尼拉與澳門的一切貿易往來。

最後，澳葡與果阿的貿易也被中斷。海上殖民強國荷蘭、英國與法國均已闖入東方，佔據了海上航線的控制權。葡萄牙的商船常常會遭到其他國家特別是荷蘭的襲擊。1640年6月，荷蘭巴達維亞總督率領一支由一千五百人組成的遠征隊進入麻六甲地區，封鎖海峽，襲擊港口，葡萄牙人寡不敵眾，終於在1641年1月向荷蘭人投降。從此荷蘭人操縱了通向東亞的咽

喉，澳門成了無依無靠的孤懸東方的港口，對外貿易一蹶不振。

澳門曾有過八年短暫的貿易復蘇。1668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簽訂和約，兩國重歸於好，馬尼拉與澳門之間恢復貿易。清政府也對澳葡採取特殊政策。1717年，清政府再下禁令，禁止商民往南洋貿易。“凡客商船隻在五省沿海及東洋貿易外，其南海呂宋、噶喇吧等外，一概不許內地商船前去貿易”。<sup>14</sup>但是，康熙帝對澳門葡人下旨，“以南洋不許中國人行走，你們原是外國人，皇上恩典，任憑你們行走生理就是”。<sup>15</sup>有此特殊政策，澳葡對外貿易曾一度有過起色，但只是暫時復蘇，此後對外貿易還是繼續衰落，最終無可挽回。

## 城市形象



圖 6. 從西望洋山俯瞰澳門中部（香港藝術博物館藏）

### 三、鴉片戰爭前澳門的文化

自十六世紀初葡人入居澳門後，幾百年間澳門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西學東漸的重要橋樑和通道，對於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起過一定的作用。西學東漸有過兩次高潮。

傳教士是近代推動西方文化向中國傳播的先行者。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傳教士紛紛東來，利馬竇等傳教士經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同時也把西方國家的數學、醫學、曆法、天文學、物理學、地理學、建築學、倫理學、哲學、美學、音樂等科學文化傳入了中國。

在天文曆法方面，傳教士幫助明政府編修曆法。1629年，明政府設立編修曆法的西局，由徐光啟、李之藻等人負責。徐、李二人曾向

利馬竇學過西洋曆法，他們吸收傳教士參加西局編曆書，於1634年完成《崇禎曆書》一三六卷，亦稱《新法曆書》。此後清朝又於1645年修成新曆書《時憲曆》，這些曆書吸收了西方曆學的科學計算方法，有解、術、圖、考、表、論等，比較準確。此後，中國基本上推廣使用西洋曆法。在編修新曆法過程中，一批論述西洋天文數學和測量儀器方面的著作也陸續介紹到中國來，其中有：《幾何原本》《勾股義》《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圓容較義》《乾坤體義》《簡平儀說》《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表度說》《天問略》等。

在地理學方面，傳教士帶來了繪製地圖等新科學技術。1583年，在肇慶傳教的利馬竇繪製出版了《輿地山海全圖》（又稱《山海輿地全圖》），這是最早傳入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1600年，利馬竇將他編纂的《萬國圖志》呈獻萬曆皇帝，這是傳入中國的第一部世界地

圖集。此外，其他傳教士也撰寫了一些介紹新地理學知識的著作，比如《西方要紀》《八紘譯史》《職方外記》《坤輿圖記》等。這些新地理學說包括地圖說、五大洲說、天體運行規律學等，並介紹世界各國分佈情況與地理概況，以及用經緯線確定方位以繪製地圖的方法，對中國地理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在醫學方面，解剖學、藥物學等西醫通過澳門傳入中國。1568年5月，澳門教區第一任主教卡內羅在澳門開辦了一所醫院，這是西醫傳入中國之始。最早傳入中國的解剖學，是天主教士羅雅谷、鄧玉函所著的《人身圖說》和《人身說概》。熊三拔著《藥露》一書，是西藥傳入中國之先河。1669年，利類思、南懷仁、安文思合撰《西方要紀》一書，談及了西藥製造方法。康熙時，從澳門來的一些精通醫學的教士在內廷供職擔任御醫，他們曾多次用西醫療法治好康熙帝的疾病。有一次康熙身患瘧疾，服用了西洋御醫的金雞納霜（奎寧）後痊癒。奎寧可能是較早傳入中國的一種名貴西藥。<sup>16</sup>

在教育方面，1535年後澳門就開始有民間私塾和“義學”存在。十六世紀初，相繼出現了由天主教會開辦的學校，進行簡單的讀寫算教育，培養神職人員。傳教士在澳門開創的東方第一所西式的大學——聖保祿學院，培養了眾多遠東漢學家和西學人才。

在建築方面，近代西洋建築經澳門傳入中國，其式樣主要有教士居住的羅馬教堂和一般商民居住的高樓洋房兩種。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建造的比較著名的古教堂有望德堂（又名瘋王堂）、聖老楞佐堂（又名風順堂）、聖安多尼堂（又名花王堂）、聖奧斯定堂（又名龍嵩廟）、聖多明我堂（又名板樟廟）、聖保祿堂（又名三巴寺）。這些教堂具有當時羅馬教廷盛行的“巴羅克”風格，其中規模最大的聖保祿教堂是巴羅克建築的典型代表。洋房大多在兩層以上設有走廊，門窗大部分圓拱形，紅牆粉壁，美觀時尚。

在繪畫方面，宗教畫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洋畫，1600年利瑪竇向萬曆帝所獻禮中含有天主聖像和聖母像。傳教士畢方濟的著作《畫答》是中國第一部論述西洋畫理論的著作。西洋畫注重運用透視法和背景，對明清繪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近代西方音樂也是隨着基督教而傳入澳門的，後又伴隨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入內地。最早傳入中國的教堂樂器是風琴。康熙年間出版的徐日升和德理格合編的《律呂正義續編》，是最早闡述西洋樂理的書，着重講授五線譜的有關知識，通俗易懂，很適合初學者。

以上客觀推動了早期西學東漸第一次高潮的形成。這次西學東漸持續了一百多年，康熙、雍正朝禁教後，傳教士來華逐漸減少，西學東漸的途徑也逐漸中斷。

十九世紀初，隨着對華貿易的擴大和大批中外人士的入居，澳門再次成為西學東漸的橋樑和通道。當時傳播主體依然是傳教士，他們活動在澳門及沿海地區，通過編輯出版書籍、行醫等方式，將域外史地知識、一些西方科技進展以及宗教等介紹到中國。

英國人馬禮遜是最早來華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於1807年開始長期在澳門活動，在溝通中英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1814年他將譯成漢文的《聖經》舊約全書在廣州出版，1823年將《聖經》全部譯成漢文並在中國傳播，第一次將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完整地介紹給中國。此外，他於1817年在澳門出版了自己編纂的《英華字典》第一卷，1823年陸續出齊六卷，共4,595頁，翻譯《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達四萬餘字。1824年，馬禮遜曾回英國，帶回在國內陸續收集的一萬卷中國書籍。

1839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在澳門開辦了中國第一所傳播西學的學校——馬禮遜學堂，第一批共招六名男生，都是窮苦人的子弟。1842年11月，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成為香港開埠後的第一所學校，隨遷過去的學生有11名。至1844年學生發展至32名。學校的課程除漢語

## 城市形象

外，包括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歷史、地理、音樂、生理學等課程，還曾開設過化學課。學生學習三四年之後，一般都能掌握英語的讀寫聽講和翻譯，基本了解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知識，具備一定的數學基礎，學生的知識面比當時的封建學塾廣闊。馬禮遜學堂是向近代中國傳播西學的第一所洋學堂，它以西學課程培養了一批西學人才。中國近代早期的改良派容闓和中國近代第一位西醫黃寬都曾是該校學生。

綜上所述，澳門作為歷史上曾經聞名世界的國際貿易大港，有過輝煌的時期，特別是在前近代，它作為中外關係的一條紐帶，曾經在東西方貿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過重要作用。澳門的這種地位和作用，直到鴉片戰爭後的1845年左右才隨着香港、上海等港口的開埠和崛起而逐漸衰落，成為被人遺落的角落，原先扮演過的角色也被香港取代。了解和回顧鴉片戰爭前澳門的這段歷史，對於我們全面理解澳門史和中國近代史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澳門今後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 註釋：

1. [明]郭斐：《萬曆廣東通志》卷六十九，《澳門》。
2. [清]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三，《險要》。
3.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佛郎機》。
4.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66頁。
5.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佛郎機》。
6.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0-71頁。
7.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2頁。
8.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4頁。
9.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5頁。
10. 石元蒙：《明清朝貢體制的兩種實踐（1840年前）》，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5年，第94頁。
11. 李德霞：《十七世紀上半葉東亞海域的商業競爭》，雲南：雲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13頁。
12. 李德霞：《十七世紀上半葉東亞海域的商業競爭》，雲南：雲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
13. 李德霞：《十七世紀上半葉東亞海域的商業競爭》，雲南：雲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16頁。
14. [清]阮元：《（道光）廣東通志》卷一百八十，《經政略》。
15. 中山市檔案局（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山明清檔案輯錄》，2006年，第411頁。
16.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頁。

